

中国现代作家选集

郑振铎

1210.2
7

86749



200192013

中国现代作家选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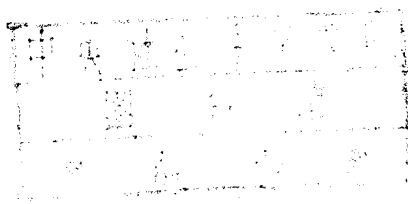
郑振铎

郑尔康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三联书店(香港)有限公司

联合编辑出版



(京) 新登字 002 号

责任编辑：孙 可 岳洪治 盛美娣

装帧设计：廖远明

郑 振 铎

Zheng Zhenduo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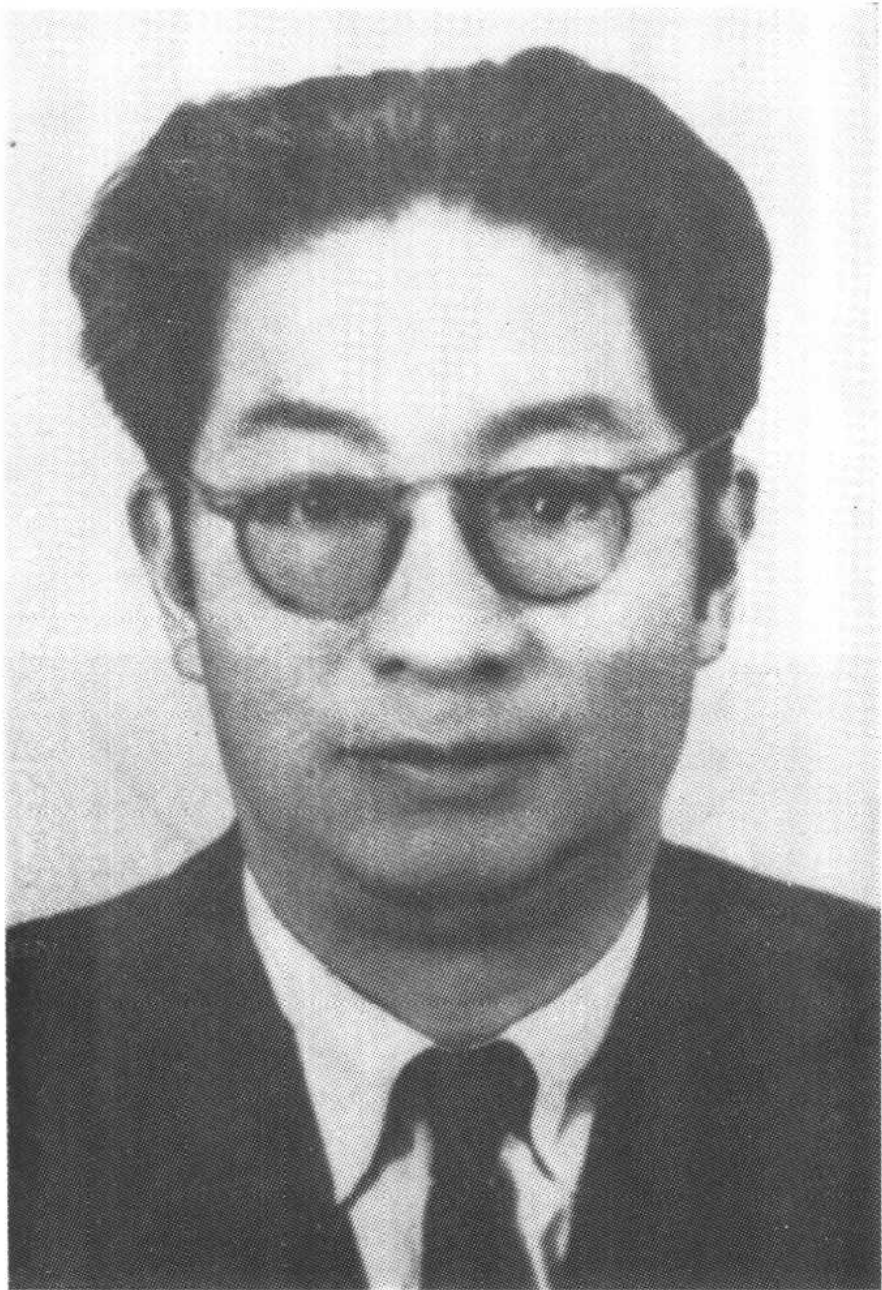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20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\frac{1}{16}$ 插页 8

1992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,800

ISBN 7-02-001443-7/I·1305 定价 5.35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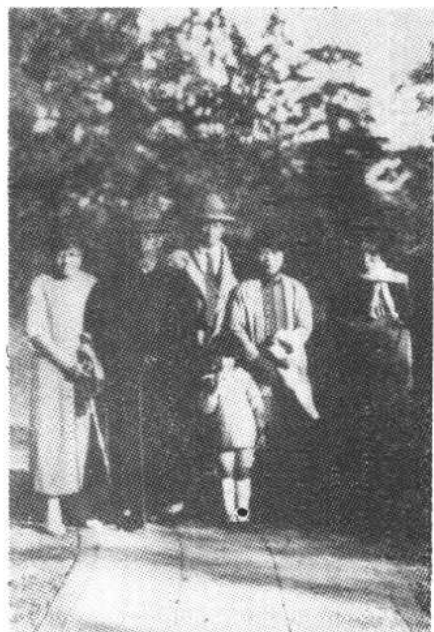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像（一九五八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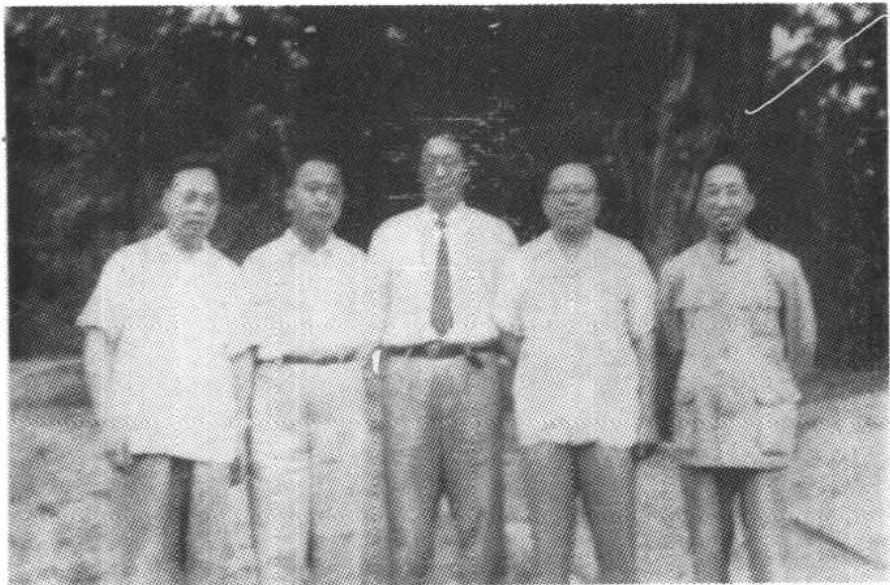
上图：作者和胡愈之(左)、王伯祥(右)摄于无锡梅园(约一九二三年)

下图：和妻女摄于上海(一九二九年)



左图：和高梦旦（左二）摄于北平西山卓居庸别墅外（一九三一年秋）

右图：和胡适（左二）摄于北平西山（一九三一年）



上图：自右至左：柯灵、王辛笛、作者、唐弢、李健吾（首届文代会期间
摄于北京太庙）

下图：自左至右：丁西林夫妇、作者、郑尔康（一九四九年秋摄于北京中山公园）



上图：访问印度前，作者（左二）与冯友兰（左三）、丁西林（右二）、
吴作人（右三）等摄于武昌东湖（一九五一年九月）

下图：一九五四年摄于徐悲鸿纪念馆开幕典礼上。左一：作者，
右一至四：罗隆基、刘开渠、李济深、廖静文



上图：作者夫妇与女婿萨空了（右一）、儿子郑尔康（左一）摄于北京寓所前（一九五七年冬）

下图：和女儿小箴及外孙女摄于北京黄化门寓所前（一九五七年夏）



作者部分著作书影

序

唐 弢

西谛(郑振铎)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,虽然他从来不曾对我以“前辈”自居。记得年轻时接触新文学,他主编的《小说月报》曾是我重要的精神的食粮。一九二一年,沈雁冰(茅盾)先生从“鸳鸯蝴蝶派”手里接过这个刊物,大事革新;从第十二卷第一期起,全面发表新诗、新小说,介绍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,翻译被压迫民族的创作小说,培养出一批后来声誉卓著的杰出的作家。实际上,这不仅仅是一个刊物的革新,而是继《新青年》之后,在文学创作方面一次和《创造季刊》、《创造月刊》等共同掀起的更为广泛、更为深入的革命。雁冰先生编了一年,继任的便是西谛。大革命失败,西谛受政治威胁,有欧洲之行,编务暂由叶圣陶(绍钧)先生代行。同心同德,坚守阵地,筚路蓝缕,戮力先驱。前辈的功绩实不可没。而我开始购读《小说月报》,正是西谛接编以后的事情。

任何一个革命行动,在其开始,总是很难得到普遍承认的,何况《小说月报》原是“鸳鸯蝴蝶派”的地盘,因此,变化愈大,招忌愈甚,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,报刊上出现不少攻击改组的文章,引起一场新与旧、民主主义与保守势力的斗争。沈雁冰、叶圣陶、郭沫若、巴金等都投入这个斗争,西谛反复驳难,一往无前,他为这个问题写了将近十篇文章。直到几十年后,我和

他谈起这件事情，对于文字游戏（例如集锦小说）、黑幕小说之类，他还是怒气冲冲，抱着深恶而痛绝之的态度。

我初次见到西谛，正当立达书店的《文学季刊》停刊，改由上海生活书店继续发行的时候。他住在静安寺庙弄。每次我去看他，满地星罗棋布地摆着陶俑、石刻和残砖，必须小心地在中间行走，然后绕到书城背后。他有时站着翻书，有时全身埋入那个单人旧沙发里，借着微弱的灯光正在鉴赏一幅插画，一部罕见书，一个已经有点破烂的经卷。这是最初也是直到最后始终不变地留在我脑海中的西谛先生的形象。

上海成为“孤岛”之后，从编印《鲁迅全集》开始，我们的过从多了起来。他写《民族文话》，编《明季史料丛书》，借用上层爱国人士的财力，和日本人争夺孤本珍籍。他购入的书目，印行的史料，分成散页，封入函套，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起，由我设法躲过日本驻邮局检查的耳目，陆续寄往内地。或径寄，或由香港转递。根据现在能够查到的材料：十月六次，共四十函，十一月十一次，共六十一函。半年之内，经我的手寄往内地的散页和目录，不下两百五十函。其中哪些是书目，哪些是丛书散页，甚至印的什么丛书，我没有问过，一点也说不上来。记得丛书种类很多。他送给我一部《明季史料丛书》，收《小腆纪》、《燭火录》等二十种，而我和他谈过要印或已印的书，却一部也不在这二十种之内。《明季史料丛书》由圣泽园印行，西谛用纫秋山馆主人名义写了序言，文章开头说：“语云，亡人国者，必亡其史。史亡而后，子孙忘其所自出，昧其已往之光荣，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。然史果可亡乎？……史不亡，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。”他在此时此地印行这套丛书的目的，序文已经说得十分明白，不需要再作任何解释了。

西谛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，这同他丰富的经历和修养有关。他学的是交通管理，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，早年参加学生运动，与瞿秋白、耿济之、许地山等合编《新社会》旬刊，介绍社会主义思潮。他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，组织过民众戏剧社。涉猎广泛，学识淹博。西谛最初爱好外国文学——尤其是俄国文学和印度文学，写过《俄国文学史略》、《泰戈尔传》，翻译了俄国和印度作家的小说、诗歌与剧本。他还研究了神话和传说，准备在《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》总题下，分三个部份写出：一、《神谱》，二、《英雄传说》，三、《恋爱的故事》，第二和第三部份已经出版。随后，他的精力又转向中国文学，编写了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文学史中古卷》、《中国俗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文学论集》，编印了《中国版画史图录》、《伟大的艺术传统》、《古本戏曲丛刊》，以及《中国历史参考图谱》。这些不仅使他能够胜任愉快地撰写《文学大纲》，编辑《世界文库》那样兼收中西文学精华的大书，而且材料涉及历史范畴，也为他撰写爱国主义的散文和历史小说打下了必要的基础。

去年以来，有人提出作家队伍非学者化的问题，认为靠经验和机智也可以写出轰动一时的成功之作，但写了一部或几篇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之后，往往有难于为继的趋势，原因是缺乏学问素养：读书不多，知识面窄。这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。我个人认为：创作是离不开经验——也就是生活的，但作家在写作的时候，光靠一点直接经验不够，他还必须调动全生命中一切可用的经验——包括从书本里得来的间接经验和各种生活知识，去支援它，补充它，这样才能把作品写好，更不必说表现其他题材的小说或者历史小说了。高尔基曾经指出：一个作家应当具有外国文学和本国文学发展史的知识，“应该尽可能知道得更多些。

经验越是多种多样，人就越得到提高，人的眼界就越广阔。”^①这就为作家队伍应当学者化提供了理论的根据。

这个集子收录了西谛先生七篇小说，十篇散文^②，也许可以算是作家学者化、或者学者作家化的具体的例子吧。西谛尝试过文学创作的各种体裁，他写过诗，写过散文，写过小说。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似乎很难说他有多少超越同辈人的地方，然而他的渊博，他的单纯，他的充满着历史感情的热烈的预言，却很难从别个作家的作品里找到。就小说而论，除了《访问》，其它六篇都是历史小说：《取火者的逮捕》取材于希腊神话，它是四个互相连贯的短篇里的一篇，成于三十年代中期，如作者自己所说：“虽然写的是古代的希腊神话，说的却是当时当地的事。”西谛借酒浇愁，正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。

其他取材于中国历史的各篇，也含有同样的意义。《桂公塘》写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文天祥，《黄公俊之最后》写太平天国时期的黄公俊，《毁灭》写南明福王朝的阮大铖，《风涛》写反对魏琅的李应升，《汨罗江》写郢都失守后的屈原。这些人物有好有坏，良莠不齐，功过互异，不过都曾映入历史这面大镜子中。西谛作此，和高尔基所说：“应当知道生活中坏的事物，像知道好的那样清楚和准确。”完全抱着相同的见解。从这点上说，那篇写国民党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实行“警管区”的《访问》，似乎也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了。

西谛的小说描写生活较少，叙述史实较多，他不大注意文学

① 高尔基：《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》。

② 本选集在唐弢先生的这篇《序》寄来后，又有所调整。小说部份增补了《猫》和《三姑与三姑丈》两篇；散文抽去《石湖》一篇。故实际为九篇小说，九篇散文。——编者

语言的铸炼，却自有朴素真率之处，在散文里表现得更为显著。这样看来，作家需要学者化，学者如果评论作品或者试写作品，要懂得创作的甘苦，那么，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学者作家化的问题吧，我这样想。

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于北京

目 次

序.....唐 破 1

作 品 部 分

散文

月夜之话	3
塔山公园	9
蝉与纺织娘	13
苦鴉子	17
海燕	20
大佛寺	23
宴之趣	27
黄昏的观前街	32
苏州赞歌	37

小说

猫	40
三姑与三姑丈	44
取火者的逮捕	58
桂公塘	74